

思想東亞

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

白永瑞 백영서 著

사상으로서의 동아시아

한반도적 시각에서 본 역사와 실천

East Asia as Intellectual Thought
History and Pract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Korean Peninsular

港台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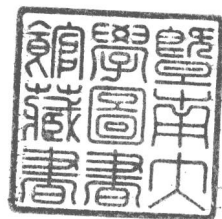
思想東亞

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

사상으로서의 동아시아

한반도적 시각에서 본 역사와 실천

白永瑞
백영서
著



台社論壇

發行人	周渝
社長	夏曉鵬
總編輯	王增勇
執行編輯	蔡志杰
助理編輯	廖瑞華、呂又慧
編輯委員	丸川哲史、王瑾、王增勇、白永瑞、汪暉、邢幼田、柯思仁、孫歌、許寶強、夏曉鵬、夏鐸九、馮建三、趙剛、瞿宛文、Chris Berry、Gail Hershtatter
顧問	丁乃非、于治中、王振寰、丘延亮、江士林、朱偉誠、呂正惠、何春蕤、李尚仁、李朝津、李榮武、林津如、徐進莊、陳光興、陳忠信、陳宜中、陳信行、陳溢茂、許達然、賀照田、黃麗玲、廖元豪、甯應斌、錢永祥、鄭村棋、鄭鴻生、魏玓
榮譽顧問	王杏慶、成露茜、李永熾、吳乃德、吳聰敏、林俊義、高承恕、徐正光、梁其姿、蔡建仁、張復、傅大為、鄭欽仁
國際顧問	Perry Anderson、蔡明發、Arif Dirlik、濱下武志、溝口雄三
網址	http://web.bp.ntu.edu.tw/WebUsers/taishe/
電郵	taishe.editor@gmail.com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誌字第6395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2634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 / 白永瑞
著. -- 初版. -- 台北市：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出版；唐山發行. 2009.09
312面； 14.8X21公分. -- (台社論壇：11)
ISBN 978-986-85037-3-1 (平裝)
1. 區域研究 2. 地理思想 3. 韓國 4. 東亞

732.43

98015211

台社論壇 11

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

East Asia as Intellectual Thought: History and Pract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作者	白永瑞
執行編輯	宋玉雯、陳筱茵
封面設計	黃瑪琍
策劃	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
排版／印刷	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16巷1號
電話	(02) 2236-0556
發行	唐山出版社，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333巷9號B1
電話	(02) 2363-3072 傳真 (02) 2363-9735
郵政劃撥	0587838-5，戶名：唐山出版社
Email	tonsan@ms37.hinet.net 網址 http://blog.yam.com/tsbooks
初版一刷	2009年9月
定價	320元(平裝)
缺頁或破損，請寄回唐山出版社更換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108.00

序言

獲得新的讀者是令人歡欣和興奮的事情。況且原以韓文書寫，如今翻譯為中文更是具有紀念意義。

實際上，我的不少論文曾在兩岸三地的漢語期刊上登載過，與部分讀者早已有了溝通的機會，據說有的文章還在中國大陸的網路上引起了一些爭論。這次在台灣學界諸位友人的支持與協助下，將其中部分論文在台灣集結出版，與讀者們建立更廣泛的對話空間，對我也是很大的激勵。

首先，我需要說明作為一名出生在韓半島、用韓語教授課程和寫作的學者，為什麼會關心「東亞的視角」的問題。

1970年代初，剛進大學時，我的思維尚侷限在「半國的視角」之中。當時雖然美國與中國之間逐漸產生和諧氣氛，可是韓半島作為東亞冷戰的中心，南北分斷體制仍然十分頑固，這支配了我們的生活和思維方式，尚且不說以東亞為單位的思維，連韓半島都無法成為自我思想的範圍。我的思維當然也只能停留在從分斷的韓半島半邊國家——不完整的(或畸形的)國家的視角來看世界的層次。

在那種氛圍的大學生時期，有機會讀到留德韓人李彌勒(이미륵)所寫的自傳小說《鴨綠江在流動》(압록강은 흐른다)，讓我開始切實

認識到「半國的視角」的侷限性。作者因參加1919年反抗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三一運動」(삼일운동)，此後為躲避日本帝國主義的搜捕而流亡德國定居。他流亡德國的旅程為我打開了豐富的地理空間想像力。當時他從京城，也就是現在的首爾，搭乘火車跨過鴨綠江，穿越西伯利亞與亞歐，最後到達德國。此一行程連在現今南北分斷體制開始動搖南北交流日益增加的今日，也不能實現。可想而知，當時這對我內心引起的震撼效果有多大。

隨著歲月的流逝，韓國國內外的形勢也不斷發生變化。1987年以後韓國國內的民主化逐步實現，1989年以後韓國之外的冷戰體制接連崩潰。就在韓國國內和國際社會急遽變化的1990年夏天，我受到美國哈佛燕京學社的邀請，做了一年多的訪問研究員。我第一次長期在外國生活，在那裡同時與各國學者交流。在那段期間中，我經驗了非常有趣的事情；我明明是中國歷史研究者，而美國人問我的卻都是有關韓國史的問題。這樣的經驗促使自己開始思索身為韓國人而研究中國史的認同性問題。於是產生了這樣的認識，即使專業是研究中國史，研究範圍不宜侷限在中國單一視角，因而也開始留意更為寬廣的「東亞的視角」的研究途徑及其可行性。

回國後，發現韓國政府已經向過去包含中國、蘇聯與東亞各國的冷戰敵營伸出了友誼之手，而中國朝鮮族和東南亞的勞動者也開始流入韓國。也就是說，一個學者甚至社會與國家，這時需要的不再是「半國的視角」，而是能夠同時觀察東亞中的韓國和韓國中的東亞，這種地理想像力的擴充。對我來說，幸運的是我個人的覺醒正切合了時代的要求。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學者們開始將東亞地域作為一個單位來思考，在韓國學術界出現了關於「東亞論述」的爭論。若是稍微誇張一點說，有如韓國知識社會重新發現了「東亞」。

可是從更深的層次來看，仍然可以從韓國思想史的脈絡找到淵

源。從遠的來說，19世紀末朝鮮知識分子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在追求東亞三國連帶的過程中，已經開始將包括韓國在內的東亞作為一個單位來思考。這種思維方式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下只能轉為地下伏流。解放後，也因從屬於美國的冷戰秩序依然不能迸發而出。只有到了1990年代，才乘著國內外局勢的變化而「回歸」正道。比較近的淵源則是1970至80年代韓國進步知識分子所具有的第三世界的問題意識，趁90年代冷戰體制的崩潰之際，以東亞論述的形態表露出來的。當時我們所提倡的民族民眾主義是對西方中心主義的一種反思，是立足於民族和民眾生活的一種反叛性理論，也是一種積極探索新的世界觀的理論，蘊含著對第三世界的關心和聯合意識。因此，在1990年代的新形勢下重構民族民眾主義時，為了克服民族主義(的封閉性)，試圖從與我們相近的地域和文明開始貫徹第三世界的問題意識，於是自然而然地將注意力集中到東亞。

自有東亞論述產生，我就是東亞論述的主要倡導者之一。在參加這場爭論的過程中，不僅在韓國，也包括東亞各地，我都盡可能參與並與相關學者討論此一問題。因為我相信，這不僅有助於擺脫束縛我們思維和行動的民族主義(國族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而且在一定時間內將能夠成為我們創造新理論、進行新實踐的動力。

當然，現在韓國國內關於東亞論述，從各種不同的見解與討論中可以看出這種論述的參與者之間存有性質上的差異。我的東亞論述也是在與這些不同立場的論爭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在韓國(和日本)被稱為「作為變革論的東亞論」，或「作為實踐課題的東亞論」。從這種概括中也可以看出，我的東亞論並不單純是一種學術成果，而是濃縮了我在大學教書和編輯雜誌的活動經驗。自1970年代末開始參與季刊《創作與批評》(창작과 비평, 1966年創刊)的編輯工作，一直做到現在主編的位置，近三十年的編輯活動對我不僅是半生的學習場所，也

是實踐的舞台。伴隨著《創作與批評》季刊，我一直探索著可使得韓國社會更民主、更人性、更具主體性的理論和實踐方案，同時為表明這種理論和實踐方案對東亞鄰國社會的發展和共生具有怎樣的意義而努力。所以，我盡可能地利用一切機會，不僅與韓國國內的，也與中國大陸、台灣、日本等地的具有批判精神的學者互相討論，共同活動。在這一過程中，我體認到超越國界的可能性，也結識了很多國際上的批判性知識社群朋友。不管本書所收錄的論文中有無直接體現，與他們交流的經驗，都大大促進了我的東亞論述在深度與廣度上的成長。不僅如此，與他們在東亞各國的交流場域中相遇，使我更貼近對方的社會和文化，從日常生活中體會東亞的實存。能夠結交這些朋友，對我來說確實是人生幸事，也藉此機會對他們表示感謝。

有關個人的東亞論述，透過閱讀本書，自然可以充分掌握。在進一步深入閱讀之前，我想對討論東亞就會遇到的一些問題先作些說明，也算是對讀者可能產生的疑問的一個預先回答。

首先，說明「東亞」這一概念和地理範圍的問題。

只要分析亞洲、亞太(Asia-Pacific)、東洋、東方等用語的歷史變遷就可以知道，地域概念在地理上並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認識主體的經驗而不斷變化的一種「創意」(invention)。舉一個最近的、比較簡單的例子，東協(ASEAN)過去將東協加上韓、中、日看作東亞，最近則根據現實需要將印度、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也包括進來，東亞甚至包括了(本來屬於南亞的)印度。因此，當我們將這一地域命名為東亞的時候，不僅要說明包括哪些對象，更要說明所設定的方向來闡釋其用途。在本書中，我所使用的「東亞」概念包括東北亞和東南亞。而且我並不將這一概念看成地理上的固定實體，而是看文化的和歷史的產物。我很早就從這一設想出發，且將「作為知性實驗的東亞」這一用語作為東亞論的關鍵詞來使用。

一般來說，東亞指的是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韓半島、日本，有時候也稱為東北亞，是狹義的東亞。像我這樣將東亞從廣義上包括東北亞和東南亞來使用，雖然看起來在儒家文化圈或漢字文化圈的同質性上有所減弱，但是從該地域在經濟上相互依賴性日益增強的現實來看，也蘊含了該地域在政治和安全保障等方面追求合作的趨勢。而且，引入東南亞，也可以避免「東北亞中心主義」的嫌疑，因為有人擔心一旦建立東北亞地域為主的共同體將會成為「超大型恐龍」，給其他地域的民眾和環境帶來災難。

另一個問題是美國在我的東亞論中占有何種地位。從日本和韓國的東亞論的系譜來看，其核心分明是對歐美中心主義的批判。可是現今美國在東亞可說是無所不在，而且我們似乎也很難擺脫這種現實。針對這種自相矛盾的狀況，一方面徹底批判美國的霸權，又不想因美國的反對而妨礙東亞地域共同體的發展，所以採取一種既充分尊重美國的利益，又巧妙地節制美國的影響力的立場。這種立場（正如傳統時代那樣）針對21世紀崛起的中國霸權也同樣適用。這種立場，我把它概括為「雙重周邊的視角」。所謂「雙重周邊的視角」，指的是同時需要「在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史展開過程中，被迫走上非主體化道路的東亞這一周邊的視角」，以及「在東亞內部的位階秩序中，處於周邊地位的周邊的視角」的問題意識。我所說的中心和周邊的關係並不單就地理位置而言，而是價值層次上的無限連鎖和壓迫轉嫁關係。這裡所說的「周邊」的存在並不單純以周邊國家為主體。透過探討在東亞現代史中沒有形成國家單位的地域或集團的歷史經驗和現在，希望不要將東亞的問題簡單化為國家、國民一元化問題。例如，被壓迫的民族或離散集團（diaspora），以及琉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台灣也可以包括在內）等在東亞論中必須得到重視，其理由也正在於此。我希望在東亞進行這樣的知性和實踐工作，即重新確立歷史上形成的周邊的多元主體的認同

性，增強變革其整體構造的動力，切實發揮周邊內在的批判精神。當我們往這個方向努力時，我相信在廣義的東亞地域的位階秩序中，堅持「周邊」的視角，在批判東亞的中心——不管是中國的「威脅」，還是美國的霸權，以及美國的盟友日本——的同時，新的和平的東亞秩序自然會得以建立。

此外，也許還會遇到這樣的問題，即被不同國家和語言所限制的人們果真能建立真正意義上的溝通嗎？東亞論述是否希望超越東亞中心主義，建立地域間(inter-region)的溝通呢？對於這些問題，我正從「溝通的普遍性」(communicative universality)這一概念出發，探尋問題的答案。我們已經習慣於將普遍性設定為超越時間和空間的有效的真理、價值或文化，可是我希望在認識論上徹底擺脫這種思維方式。我將普遍性(不僅僅是真理)看作被廣泛認定的、協議的結果。為了達到協議，需要多數的認同和承認，這就必然要以認識主體間的溝通為前提。可是現實中我們經常會遇到非溝通的(而是壓制的、霸權的)普遍性(uncommunicative universality)或溝通的個別性(communicative individuality)的例子。如何能夠克服這些，實現溝通的普遍性呢？與其輕率地追求認識的共有，不如先認識這樣一種普遍性，即是彼此間存有差異和距離，經由相互交流和溝通，在原有的脈絡上認識到自己與他者在不同的個別性中亦有某種普遍性，我們從中也得以發現相互理解的可能性。總之，我要強調的是，能夠使溝通成為可能的普遍性要素存在於個體之內，因此在個體間溝通過程所產生的共感和想像力的彈性作用下，普遍性能夠得以確立。從這種覺悟出發，也許能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

下面再簡單介紹一下本書的構成和各章的內容。

首先，關於書名《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是在多位學者的推敲之下才確定下來的。我認為這一書名濃縮了我思考的基

本問題。「思想」一詞常作為「名詞」使用，而在這裡是作為動詞使用的。所要表現的是將東亞作為思想的課題，思考東亞、想像東亞的意思。而所謂韓半島的視角，所強調的不是僅從南韓，而是從「分斷的南北韓的相互作用的韓半島全體」來看問題的視角。之所以要突出韓半島的視角，並不僅僅是因為我的生活場所在韓國就特別關心這裡，而是因為韓半島是世界層次的霸權支配體制的重要現場，所以這裡的變革也將是對世界層次的壓迫體制的一種衝擊，希望其能成為促進資本主義世界體制變革的催化劑。

第一章是有關於東亞共同體論述的三篇文章。

作為一名人文學者，我所感興趣的與其說是東亞共同體本身，不如說是東亞共同體的敘述方式。所謂共同體這一用語最初產生於日本，在華語文化圈很少使用，最近主要用來指稱以歐洲共同體為模型的，在東亞根據國家間的協議而形成的制度性的國家結合體。此外，也有人用來指東亞的烏托邦。還有人批判說，它是依據均質的價值或情感（愛國心、集團精神等）統合而成的，要求其成員具有排他性的歸屬感的東西。在本書中，一方面比較分析在韓、中、日三國所產生的關於東亞共同體的各種論述，另一方面分析其在東亞地域秩序的歷史和現實中占有怎樣的位置。尤其若是想要東亞共同體如同追求的人們所期待的那樣成為和平的共同體，我強調指出，必須從兩個方向同時推動這一進程，一是在組成這一地域的國民國家之外進行的國家間的統合過程，一個是在國家之內以極大化成員個人的參與為方向的內部改革過程。

第二章是三篇分析在東亞國民國家所起的作用的文章。

雖然現今在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多傾向於批判國民國家的作用，但我作為一名歷史研究者，對國民國家在東亞近代史上所起的雙重作用，即「解放」和「壓制」的歷史卻比較重視。而且，為了探索出能

夠克服這種 20 世紀型國民國家的道路，我認為應該從「東亞的視角」，以批判的眼光來看待國民國家。我正是從這種視角出發，分析韓、中、日的國民國家的作用，尤其是重點分析了中國國民國家的歷史。這裡雖然沒有集中討論台灣的問題，但在所收錄的文章中也多少有所涉及。

第三章則是三篇論述韓國人的中國認識的文章。

由於學識的不足，雖然以韓國人的中國認識為重點，但貫穿三篇文章的問題意識卻是東亞人的相互認識。不管是要建立東亞共同體，還是要形成和平共存的東亞，都不是單靠制度的變化就能實現的，如果運作體制的主體的認識不改變是不行的（最近國際政治理論上社會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頗受重視，大概也是出於同樣的理由）。可是，現在東亞人的相互認識中，歷史經驗依然發揮著很大的作用。從這種觀點出發，韓國人從古到今對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人是如何認識的，中國人又是如何認識韓國人的，對此進行比較分析也是一件有意義的工作。我們只有正確理解了歷史的軌跡，才能在歷史遺產面前自由地創造新的未來。

第四章所收錄的主要是為了實現東亞歷史認識的共有，而分析歷史敘述問題的五篇文章。

作為對我們的歷史認識發揮重要影響的歷史敘述的制度設置，我所關注的是作為制度的歷史學和歷史教科書。因為歷史教科書問題現在造成了東亞國家間的歷史糾紛，也成為歷史學界關心的焦點之一（在台灣，圍繞「台灣意識」的歷史敘述，也出現了關於教科書的爭論）。我針對學術界的這一動向，重點分析了韓國和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中是如何認識東亞的。在 20 世紀，各國主要關注的是在一國史的視角下編撰本國的「國史」，而我則從歷史教科書中抽出有關東亞認識的內容，從而揭示出以國史為主的敘述方式所存在的問題。通過這種研究，展望建立「國史」和東亞史可以相互溝通的東亞地域史的可能性。我想強調

的是，如果想使教授東亞視角的歷史教科書編撰成為可能，就不僅要在國家主導的教科書制度內外進行變革，同時在學院這一制度之內生產歷史知識的歷史學（尤其是東洋史）也應有所變化。

最後想要指出的是，本書的出版得到許多朋友的幫助。這裡所收錄的文章，都在韓國等東亞各地各種機構所舉辦的學術討論會上做過口頭發表，並在一些刊物上登載過，可惜這裡不能將歷次學術討論會的邀請者和評論者，以及幫助提供在期刊發表機會的各位一一列舉。但其中有幾位我還是想列出他們的名字，特別表示感謝。首先，要感謝為本書出版而奔波勞碌的陳光興學兄。我們於2001年第一次相遇，雖然認識的時間不算太長，但是從第一次見面時起，就成為能理解彼此情緒和思路的知己，也一直作為東亞連帶活動的主要合作者互相幫助。還要特別感謝為本書寫了推薦詞的孫歌女士。我們三人雖然活動地域和專業領域各不相同，但相信能夠超越這些界限，成為同道的同伴者，維持彼此的合作熱情。此外還要感謝為本書寫了推薦詞的白樂晴先生。他在韓國作為《創作與批評》的創辦者，是韓國社會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與他在一起工作的三十年，對我來說是十分寶貴的人生際遇。

實際上這裡所收錄的文章最初都是用韓語寫成，然後翻譯成中文的。翻譯和校對得到了多位朋友的幫助，這裡要特別感謝王元周（北京大學）、王恩美（台灣師大）、李珠海（韓國延世大學）和梁台根（韓國翰林大學）教授，與出版校對工作的宋玉雯、陳筱茵，均藉此表達感謝之意。王元周教授翻譯了大部分的文章，是本書的主要翻譯者。可是文章的最終責任還是要由我自己來負，因為我對翻譯稿進行了校對，有些翻譯用語也按照我的要求作了修改。在這一過程中，也切實感受到東亞雖然都屬於漢字文化圈，漢字用語還是存在著微妙的差異，這也算是一個意外的收穫。

為了本書的出版，我在修改自己過去所發表的文章的過程中，對自己的書寫態度也有所反思。我在形成東亞的視角後，每當寫文章時心中不僅有韓國讀者，也同時考慮到漢語和日語讀者。這不僅僅是考慮到文章的漢語或日語翻譯問題，而是考量他們的想法來構思自己的文章。本書出版後，我和漢語圈讀者共用的空間，也許能成為相互討論和交流的公共圈。可是，我希望將來不僅能成為討論的空間，也同時能成為情感的空間，發展成一種親密圈。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作為作者的我首先應懷有深切關懷東亞人日常生活的心情。我相信這本書能提供擁有這種生活態度的機會，於是感到這份工作是有意義的，個人的內心裡並因而充滿快慰與成就感。

目錄

序言	I
第一章 東亞共同體論述	
一、東亞地域秩序：跨越帝國，走向東亞共同體	1
二、和平想像力的條件與界限：反思東亞共同體論述	21
三、東亞論述與「適應近代和克服近代」的雙重課題	39
第二章 國民國家的這邊與那邊	
一、超克20世紀型的東亞文明與國民國家：韓民族共同體的選擇	61
二、在中國有「亞洲」嗎？——韓國人的視角	94
三、中國的國民國家與民族問題：形成與轉化	112
第三章 韓國人的中國認識之軌跡	
一、「便利的誤解」的歷史：韓、中相互認識的軌跡	141
二、韓國人歷史經驗中的「東洋」：20世紀前半期	151
三、大韓帝國時期韓國輿論的中國認識	171
第四章 企求和平的東亞歷史敘述	
一、突圍本國史的框架：從歷史教科書來看韓國人的亞洲認識	203
二、20世紀前半期中國人的東亞認識：中學歷史教科書的分析	218
三、跨越制度的內與外：重構東亞歷史教科書和歷史教育	230
四、「東洋史學」的誕生與衰退：東亞學術制度的傳播與變形	246
五、本國史與地域史的溝通：反思東亞歷史敘述	271
附錄 相關史事年表紀要	292

第一章

東亞共同體論述

一、東亞地域秩序：跨越帝國，走向東亞共同體

（一）三個帝國與東亞秩序

超越紛爭和分裂的歷史，建立和平、共存共榮的東亞，不僅在韓國社會，在東亞各地都在熱烈的討論，並有人試圖付諸實踐。處在21世紀之初，如果我們要想能真正擔負起這一重任，則需具有能突破現實束縛的創造性思維。回顧東亞秩序歷史的動機也正在於此，追溯歷史也許有助於培養我們的創造性思維。

所謂東亞秩序，指的是在一定歷史時期內東亞國際問題所適用的，或維持國際關係的某種特定範式。這裡之所以要用「一定時期」來對其時間範圍加以限定，是因為東亞秩序自古就是不斷變化的，而且相信將來還會發生變動。實際上，如果回顧一下影響東亞國際關係的特定範式的演變軌跡，就會發現東亞國際關係是伴隨著中國、日本、美國等中心國家的交替變化而不斷被重新規定的。所以，本節擬通過考察中華帝國、日本帝國及美帝國所主導的東亞秩序之形成、膨脹與消亡的過程，來分析各時期東亞秩序的歷史特點。

當然，對這三個秩序都通稱為「帝國」，也許會引起爭議。為了盡

可能避免可能產生的誤會，這裡有必要首先簡單說明一下此處所謂的帝國的意義。帝國概念的核心也許就是：帝國在本國和周邊國家——在東亞則先後有朝貢國、殖民地、衛星國的性質變化——之間的關係上設定一定的位階秩序，享有規定帝國勢力圈之內各國對內對外政策的權力。從這種意義來看，完全可以用帝國的視角來比較近代以前和以後的東亞秩序的運作方式。如此不僅可以更有效地分析各秩序的特徵，而且能夠更好地理解各秩序之間的連續性。

當然，從帝國的視角來看東亞秩序，也會過分抬高中心國家的規定性，而相對忽視了在東亞秩序中處於周邊地位的國家的作用，以及東亞秩序的變化過程。所以這裡也儘量考慮到了周邊的視角。¹ 尤其是以周邊國之一的韓國的地位和作用為焦點，回顧東亞秩序的歷史，展望21世紀新東亞秩序產生的可能性。

（二）中華帝國與小中心

傳統時代東亞國家間關係的特定範式，大體上可以稱之為中國主導的華夷秩序。可是如果將這規定為中華帝國的秩序，也許會有人提出異議。所謂中華帝國，並非單純指皇帝統治下的中國政治體制（即帝政），而是規範構成一個帝國圈的帝國本國和周邊國家的對內對外政策的位階秩序。在這個意義之下，東亞國家之間的關係是否真的是「華夷秩序」，也許還有不同意見。

中國的華夷秩序，一般理解為以中國皇帝與周邊各國的國王之間所形成的禮儀關係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它起源於秦漢統一王朝出現以後，中國王朝與周邊各國家和民族所建立的政治關係；到後來，具有世界帝國特徵的隋唐出現以後，其特徵更加明確。雖然隋唐世界帝國

1 至於周邊的視角的多層次意義，參見崔元植、白永瑞編（2004）《從周邊看到的東亞》（주변에서 본 동아시아）中所載的筆者序言，首爾：文學與知性社。

解體，但15世紀初明朝建立以後，隨著朝貢制度的形成，這種國際秩序也進一步體系化。

這種華夷秩序的第一個特徵，就是中國人的世界觀——華夷思想——成為這一秩序最為核心的理論基礎。從將中國視為世界中心的本位民族中心主義出發，將中國作為文明的中心為「華」，而把周邊視為落後的「夷」，即以文明的程度來確定彼此的地位差別，從而形成位階秩序的文明圈。可是，由於周邊國家和民族也可以接受這一文明的標準，因而具有文化普遍主義的外形。當然，歷史上中華帝國也根據自身所處的現實狀況和需要，有時也有選擇地使用武力強迫周邊屈服。但由明清時期所表現的典型的朝貢關係可看出中國並沒有直接統治周邊的意圖，而是採取冊封周邊國家的君主、在內政和外交上發揮影響力的間接統治方式。特別是滿洲族所建立的清朝，在廣大的版圖內統治著多個民族，表現出多元的景象。與這種間接統治方式相輔相成的是，周邊國家也分享著中國的天下觀乃至華夷觀，具有一種文明共同體的性質。正是因為有了這種特點，所以中華帝國秩序，往往並不是由中國單方面強迫建立支配從屬的位階關係；與近代世界出現的帝國主義的支配關係相比，能夠建立範圍更加廣大，更加多元、寬容的秩序。從今天的立場看來，這也許可以成為我們探索帝國秩序的替代方案的一種思想資源。²

2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中國大陸出版了一些著眼於這種論點的研究成果，如汪暉(2004)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北京：三聯書店)和趙汀陽(2005)的《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江蘇教育出版社)。在汪暉看來，朝貢體制是以王道這一倫理觀念為基礎的，其中可以找到足以對抗近代民族國家惡性膨脹而產生的帝國主義理論，體現亞洲的、近代的、內在連續性的理論資源。趙汀陽則將中國古代的「天下」觀念與現代國際政治相嫁接，提出要廢除「帝國秩序」，代之以「天下秩序」(沒有異端或他者的世界秩序)。在中國之外也有類似的主張，在型構21世紀東亞地域秩序的規範時，重視華夷秩序的理念和原理(以大同主義為基礎的調和與共存理念，儒教原理的道德主義、相互主義、均分主義等)，並注意到因這些理念和原理與現實、實踐發生詭離而導致被歪曲或形骸化的歷